



世界知名学者权威解读苏联解体真相

改变世界的七年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英】阿奇·布朗 著

- 戈尔巴乔夫上台与下台始末
- 东西方铁幕为何消失
- 权力的大堤怎么毁于蚁穴
- 改变世界的七年究竟改变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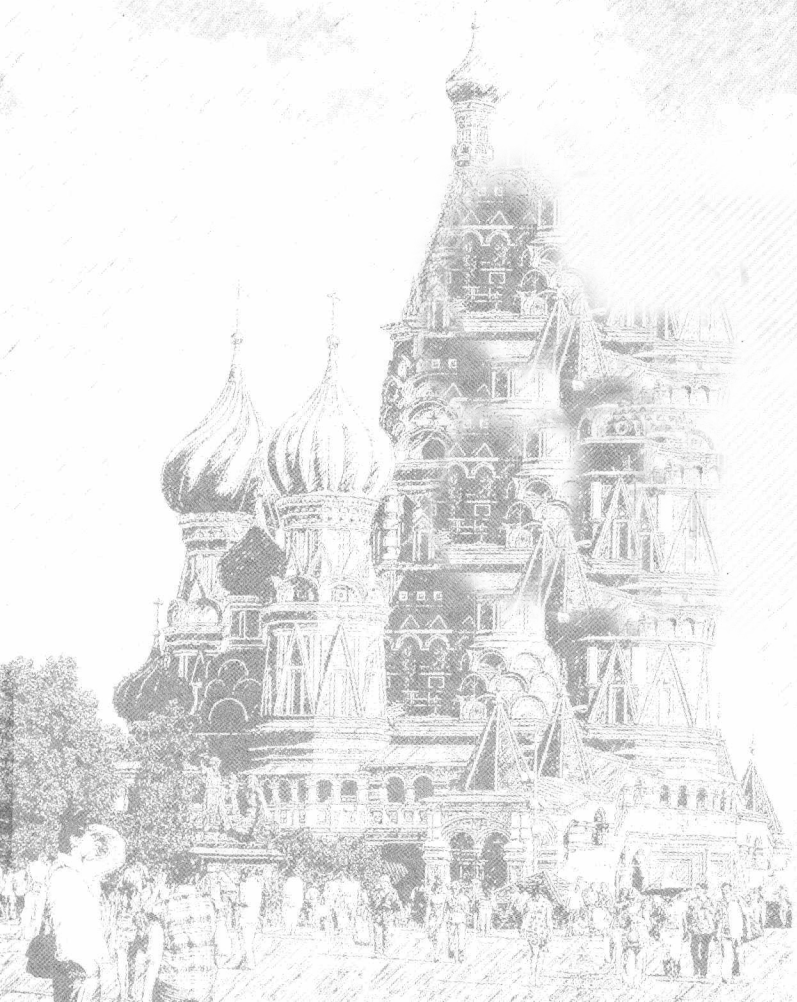
世界知名学者权威解读 **苏联解体** 真相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改变世界的七年

【英】阿奇·布朗 著

韩凝 许宝友 张文成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变世界的七年 / (英) 布朗著; 韩凝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011-9848-1

I. ①改… II. ①布…②韩… III. ①戈尔巴乔夫—人物研究 IV. ①K835.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175 号

京权图字: 01-2009-6748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7 by Archie Brow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改变世界的七年

作 者: [英] 阿奇·布朗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刘 飞

责任编辑: 贾晓伟

责任校对: 刘保利

封面设计: 维诺传媒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o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848-1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言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是事后的观察和思考。由于苏联解体，许多档案资料解密，上述两个部分的写作就参考了许多档案，受益颇多。第二部分则带有“实时”写作的色彩，也就是说这些文章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仍处于巨大转变的过程中写作的。

我非常感激牛津大学出版社总编拜厄特对于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建议和耐心。我也非常感激他以及四位匿名读者所做出的结论，认为我在20年前所写的文章仍具有再次出版的意义。此外，他们还肯定了将这些文章与我所撰写的新的文章放在一起，仍能保持其连贯性并构成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本书在章节安排和框架设计方面吸收了他们不少颇有启发性的意见。

对那些我曾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写作并发表过的文章，在本书中，我只做出了微小的改动，删除了个别地方，以避免重复。但是鉴于新资料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些资料与此前的文章内容混淆，我增加了一些注释。新的注释的目的在于：（1）纠正某个误解或者澄清某个事实；（2）利用新的资料（尤其是解密档案）更新对某件事情的描述和分析。对此，我并没有改动原来发表过的文章，以显得我在苏联时代的观点多么富有远见。

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一部记录苏联1985—1991年岁月的通史。尽管篇幅相当长，但是比起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一本书《戈尔巴乔夫因素》来，这本书还是显得简短了许多。本书是对苏联改革的一种解释，这场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戈尔巴乔夫及其在苏共领导层中的少数盟友发动的，被视为一场激进的改革或者说“来自上层的革命”（正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所描绘的那样）。对于变革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导人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有时局限在很窄的范围之内。改革的含义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这个词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正如我在第四、第五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一点在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本书第二部分说明了我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1985年以后，苏联社会逐渐开放起来，人们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于这个社会还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需要从有限的信息中揣摩事态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时间的推移，这种揣摩工作就显得多余了。在写作第二章至第五章时，我接触的资料比我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所能查阅的资料少得多。到了90年代，已经出现了相当丰富的回忆文章和著作，而且很多访谈透露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

然而，在写作眼前这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的时候，我所能查阅到的资料比我在撰写《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时更加丰富了。我利用了许多在写作前一本书时无法了解到的有关改革情况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政治局的会议记录，既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的详细笔记，也有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后者中的许多内容可以在以《全宗89》(Fond 89)而闻名的档案集中找到，它是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材料选编的一个档案集。根据叶利钦于1992年发布的指示，这些档案得以向研究者开放，并作为试图起诉共产党、证明他们“完全无视人权和国际法”的行动的一部分提交给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①《全宗89》包含3000多份文件，时间跨度覆盖了从1919年到苏联解体的整个时期。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也可以查阅到，在西方国家的几个大图书馆也有缩微胶卷可资利用。我是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特别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查阅到这一资料的。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摘要也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查阅这一文件集的。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1985—1991年期间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供研究人员参考，但是我所能看到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对于政治局会议记录的利用需要特别注意，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学者，特别是撰写有关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国内政治情况的学者利用过这一资料。当然，那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冷战结束原因的学者是个例外。人们对这些记录往往信以为真，但却很少注意它们编纂和审批的过程。然而，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文本上讲，我既利用了“正式的”工作记录，也利用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特别是切尔尼亚耶夫）编纂并收藏于戈尔巴乔

夫基金会的记录。前者有许多可以在《全宗 89》中看到，有一些则可以在《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中找到。我没有发现故意篡改的证据。不过，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档案材料和比较“正式的”记录都可能存在偏见，至少在选择所记录的内容方面是如此。^②

尽管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很大，足以容纳 80 人左右，但是政治局会议禁止速记员参加，出席会议（但没有发言权）的人包括总书记的助手。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从斯大林时期以来一直严格执行的一条禁令，即不仅禁止做速记，而且在会议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笔记都是不被允许的。^③如果（似乎也可能）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这个不成文规定，那么他显然对它视而不见。确切地说，他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以及他在政治局的支持者梅德韦杰夫，都是一丝不苟地做笔记的人。^④没有理由怀疑这三位政治局会议参加者记录和誊写的笔记的完整性。从我对这些记录的解读来看，存在的唯一偏见是，这些人更感兴趣于记录戈尔巴乔夫的言论，而不是同样详细地记录政治局其他每位委员的发言。这些记录偶尔也会提及另一位发言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但是不记他所讲的内容。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不是在做正式的记录，而是在寻找政策线索和行动原则，出现这种差别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制度的等级性，在那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比其他任何政治局委员的观点都显得更为重要。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本人都是坚定的改革者，他们一直也是戈尔巴乔夫有力的支持者。但是这样记笔记有可能造成一个结果，即他们的笔记可能轻描淡写地处理了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所表达的保留意见。虽然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记录中确实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保守的政治局委员的观点所占篇幅比“正式的”记录中看到的篇幅少许多。^⑤

“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负责人的监督下制作的——所有文件（包括公民致中央委员会或总书记的信函）都要经过这个部门才能向上传达。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可能从速记员秘密记录政治局会议的工作中得到了很大帮助。^⑥关于记录过程，有一个版本说，速记员就在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厅下面的一间房子里工作，有人把会议情况传输给他们。还有一个版本说，他们靠听录音工作。^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速记员在单独的一间房子里工作，逐字逐句地记录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发言。

然而，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确切地说，如果把录音带给了速记员，那也是没有经过批准的。

无论速记员是否参与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工作——迄今为止看到的证据是矛盾的，很显然，不会由他们来决定保留什么和不保留什么。事实上，博尔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有关他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共事岁月的回忆录中，就透露了这一做法的制度规定。^⑧在描写政治局会议的座位安排时，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左边还有个桌子，桌旁坐的是总务部负责人和第一副手。他们负责记录工作”。^⑨

总务部负责人负责会议记录，这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先后担任总务部负责人的是卢基扬诺夫和博尔金，博尔金于1987年接替卢基扬诺夫。除了担任总务部负责人之外，他们还都参加了1991年8月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并因此度过了一段囹圄生涯。在改革初期，有理由假定他们俩人都是忠于戈尔巴乔夫的，但是自1988年起，随着改革进程的激进化，他们越来越失去幻想，开始接近领导层中比较保守的力量。博尔金从1981年起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直到1987年晋升为总务部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仍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密切共事。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担任苏联总统后任命博尔金作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因此他在1991年参与政变被戈尔巴乔夫和其亲信视为是特别严重的背叛行为。

博尔金在他对戈尔巴乔夫半回忆半批评性的传记中表示，早在1991年8月最后摊牌的几年之前，他就对他所伺候的这位领导人的作风感到不满，对他的决策不再信任了。作为一个在急剧变革和混乱年月里负责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的人，他在决定什么内容收入或排除于速记员准备的报告时，很可能选择了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式的”记录可以被看作是对戈尔巴乔夫助手所作记录的补充。鉴于博尔金对他的政治主子的敌视与日俱增，这极有可能使他的报告带有偏见，因此“工作记录”不应当被当做最可靠的记录。毫不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相信博尔金所批准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权威性”。^⑩我与少数利用“正式”记录的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我把它们视为宝贵的资料来源，认为它们可以提供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一些事情的详细情况。说到对它们的使用要极其小心，就我判断，不是因为报告不准确，而是因为可能存在编辑干预和选择倾向，尤其是在1990—1991年的危机年月里。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套官方正式制作的会议记录存在。一套是工作速记记

录，它逐字逐句记述了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但不送给他们本人，甚至可能也不送给总书记审看，因为他还有堆积如山的其他文件要阅览。这份记录仅有一份原件保存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④另外一套记录与工作记录不同，它们可以称之为会议纪要，主要摘编了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记录下了政治局会议做出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决定。前者并不散发，但是纪要常常以会议记录摘要的形式——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送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其他所有或某些成员，具体送给谁，则取决于所涉及的问题与谁相关。这些文件中的大多数文本可以在《全宗 89》的档案中查到。

政治局会议在星期四召开，博尔金在星期六向速记员口述会议纪要，同时他也可能完成了会议工作记录的文本。从现在收藏在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的工作记录中，可以看到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的详细记述。关于这些记述的编纂方法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问题，但其中有一点现在清楚了，那就是总务部负责人对于什么内容将写入这些记录拥有最终决定权。因此，在领导层分歧扩大的那几年里，正是博尔金，这位长期与戈尔巴乔夫存在意见存分歧、对戈尔巴乔夫愤懑不满，并且最终在 1991 年 8 月公开站出来对抗的人，决定了在会议记录中谁说了什么，是否重要并值得保存到后世。

在改革初期，西方主要辩论的问题是：这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盟友采取的一种装点门面的策略。现在，对于戈尔巴乔夫究竟打算在变革的道路上走多远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尘埃落定了，但是对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发展仍然普遍缺乏深入了解。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学者们不断引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并想当然地认为该书就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最为权威的阐述。然而，这本书出版于 1987 年，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念实质上在 1988 年已经变得更加激进了，并且在继续演变。一份迄今尚不为人知的档案材料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戈尔巴乔夫在 1989 年 3 月完成了另一部书的手稿，但是他决定不发表。在这部书稿中，他的思想已经比 1987 年时更为前进了，但是与他提交给 1990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或与他提交给 1991 年 7 月 25—26 日中央全会的党纲草案相比，这本书只是他政治思想演变的一个阶段——这些文件得到了大会和全会的批准，但很多与会者显然毫无贯彻实施它们的打算。虽然这份尚未发表的手稿也远不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展的最后定论，但它是一个应该引人注意的历史文件。我非常感激戈尔巴

乔夫基金会允许我查阅了它所收藏的这份文件。这本书的名字叫《改革——生活体验：日记手稿》，本书多次引用了其中的有关内容。

在苏联改革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和大众媒体对改革的范围和意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也全身心地投入了这股争辩的浪潮当中。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争议性，其中包括苏联制度变革和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冷战结束的原因等。关于冷战的结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这是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因为政治家仍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此外，这还与一个更为广泛的、也是具有现实价值的课题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一个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怎样才能实现转型。这些都是本书将探讨的主题。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众人相助，在此谨表谢意。开始，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埃利奥特基金资助了一些与本书有关的学术访问活动，英国科学院小额研究补助项目则为最近的一些工作提供了支持。这两项资金来源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对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进行了多次访问，并且卓有成效。其中，我对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得益于斯坦福大学俄罗斯、东欧和欧亚研究中心的盛情和他们让我担任2006年度亚历山大·达林纪念讲座主讲人的邀请。

并不是所有的资料都面向一般公众开放（包括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局会议报告），就获准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查阅研究资料而言，我要特别感激戈尔巴乔夫、伊琳娜·戈尔巴乔娃和切尔尼亚耶夫。除此之外，我还要对该基金会的库瓦尔金、兹德拉沃梅斯洛娃、帕拉日琴科和库兹涅佐夫致以谢意。我在华盛顿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研究得到了萨弗兰斯卡娅的鼎力相助，我十分感谢她。除了《全宗89》和《沃尔科戈诺夫文件集》外，我还利用了国家安全档案馆收藏的“冷战的终结”的文献。在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的达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助理档案员利登哈姆和索罗卡，向我介绍了该所丰富的文献资料，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波德斯科拉诺娃在研究方面给予的帮助，使我不仅广泛利用了《全宗89》的内容，还有机会阅读了一些访谈，这些访谈是作为有关冷战结束的“胡佛研究所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莫斯科）文件集”的一部分收藏在那里的。

我也非常感谢身边那些为本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秘书威尔科克斯欣然接受了把一些过去的文章重新录入计算机的任务——它们出现在本书第二部分。他总是能用某种方式把中心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的两个工作妥帖地兼顾起来，同时作为后者，他还能帮助确定圣安东尼学院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有参考价值的书籍摆放在何处。我还要感谢科兹洛娃在牛津期间所做的一些娴熟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梅佐使我注意到了几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帕特，她编辑了全书的索引。1966—2006年间，我曾先后四十多次访问俄罗斯，在大多数访问中她都陪伴在我身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礼物。

我认为其他学者对本书的两章内容所做出的评论很有帮助。库瓦尔金教授给我提供了关于第六章的宝贵意见。同一章也从2005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中东欧研究国际理事会第七届世界代表大会与会者的提问中获益匪浅，当时，这一章的最初版本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大会。普拉夫达和沙拉普阅读了第九章——关于冷战结束的初稿。我对他们二人提出的有益评论表示感谢。毋须多说，如果第六章和第九章因我的解释或任何事实或判断错误而受到指责，与对它们提出善意评论的人无关。访问莫斯科总是令我非常愉快，因为我在那里见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好朋友。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别感谢雷尔和西蒙尼扬、奥博龙斯基和奥博龙斯卡娅，以及戴维和高恩，感谢他们的慷慨好客和友谊。

我由衷地感谢各位编辑和出版者（他们都在美国）允许翻印我以前发表过的文章。第二章除外，因为发表那一章的杂志《共产主义问题》将翻印的权利授予了作者，并且，不管怎样，它已于1992年停刊——这个决定并不令人吃惊。虽然《共产主义问题》杂志是通过国会投票、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但是它享有盛誉，这是由于它发表的分析文章不仅立意高深，而且在观点上也百家争鸣，并不一定符合当时美国政府的主流观点。

如果本书的某一章已在其他地方发表或利用了我以前发表的文章，有关最初发表的情况会在那一章的第一个脚注中注明。我十分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重新发表旧作：《世界政策杂志》的出版者允许重新发表第三章和第四章；《革命记事》的编辑布伦伯格和名人图书公司允许重新发表第五章；《斯拉夫评论》的编辑戴凯恩克尔和该杂志的出版者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允许我在第七章中大量引用我在该会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编辑布雷斯劳和领先出版公司



允许我重新发表我在《后苏联事务》上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第八章的基础。由于作为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基础的一些文章是在苏联解体后写的，因此我做了一些删节，也增加了不少新材料。

阿奇·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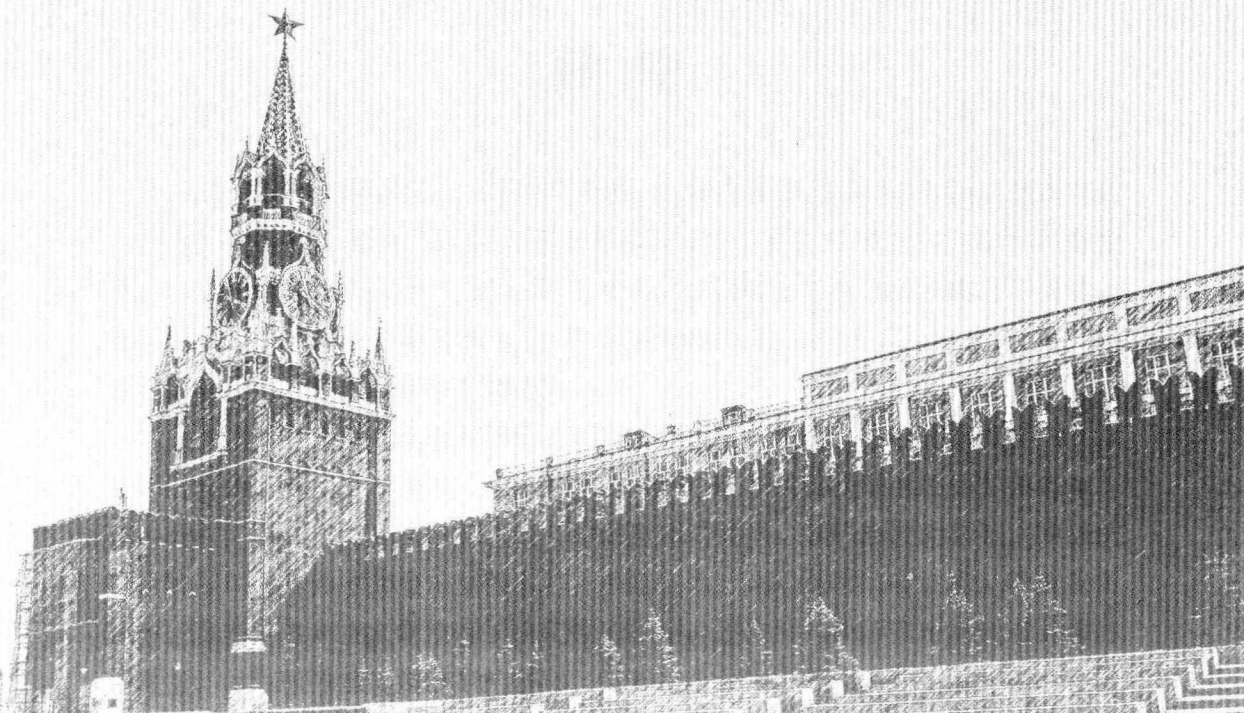
2006年于牛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	(23)
第三章 苏联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6 年	(51)
第四章 1987—1989 年，根本的政治变革	(77)
第五章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	(103)
第六章 改革的起源与发展：制度双重性还是公民社会？	(121)
第七章 制度的瓦解与国家的解体	(143)
第八章 共产主义转型中的国际影响	(159)
第九章 结束冷战	(177)
第十章 透视戈尔巴乔夫及其时代	(201)
注 释	(235)
译后记	(278)

第一章

改变世界的七年



导论

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仅在 7 年的时间内，东欧会剧变，苏联会解体。然而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也不乏观察家迅速地站出来指出这一结果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的确，像这种在许多（虽然并不是全部）方面都效率低下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但也必须看到它在 70 余年的时间里也经历了无数的风雨考验，并且保持强大的政治和军事防御能力。

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解体的各种过于泛泛而谈甚至误导性的观点受到关注并广为流传。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制度已经变得奄奄一息，行将瓦解；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种观点则论述到，苏联制度的转型、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主要是由里根政府一手促成的；同样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对摧毁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另一种颇有市场但却荒谬的看法是，叶利钦的统治是改革的继续，只不过是采取了更加民主的形式。本书的各个部分，尤其是最后一章将对这些简单化或错误的观点详加论述和批驳。^①

和平变革难以在一个固化而高度威权的制度中产生和发展。在民主国家中政府的某些失误很容易导致政权的更替，但是在威权主义的统治下，特别是在像苏联这样成熟的制度下，同样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不同于东欧的大部分政权——本质上是外国强加的——苏联的制度深深扎根于俄国的土壤之中。直到苏联改革前夕，领导者们还能老练地使用手中的“红萝卜”和“大棒”，迫使未曾壮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萎缩成为几个微不足道和边缘化的团体。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苏联已经濒临崩溃，无论其最高领导层内部发生什么，它都必将走向衰亡，这完全是异想天开。

政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尤其是高度威权主义的体制，也不会永远一成不变。然而，尽管它们在政治上存在很多问题，经济上效率低下，但这并不妨碍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来进行自我维护，以存在更长时间。苏联政权可以通过控制教育系统和大众媒体来操纵舆论，以及动用其他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清除有



组织的持不同政见者。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第二天戈尔巴乔夫被选定为这个国家新的领导人，这个决定完全是由核心领导层——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做出的，后一机构迅速批准了前者的决定。对于普通的苏联公民而言，这种事情就像天气一样不受他们的控制。^②

虽然领导层没有感受到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明显压力，但是对政治精英当中更富有远见和思想性的一些人来说，存在着刺激变革的重要因素。苏联与西方国家（甚至事实上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80年代上半期苏联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处于下滑状态。虽然这一切并不是1985年才出现的新现象，而且以往的苏联领导层总是把注意力转向别处却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重振国家雄风和解决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最初做出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

戈尔巴乔夫知道，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仍感到非常遗憾，^③所以他经常表示：除了改革，别无选择——苏联当时处于一种“危机前”的状态，甚至处于“严重危机”之中。^④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也指出，他本来可以维持现存的制度，不使其发生根本改变，但这在道德和政治上无法接受。^⑤这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苏联或俄罗斯肯定不可能在没经实质性改革的制度下长期繁荣兴旺下去。然而，轻微的改革外加强有力的管控，也能够使苏联的制度和这个国家都得以维持到21世纪。1989年3月戈尔巴乔夫完成了一部著作，后来因其已落后于他自己的思想和政治发展的步伐而决定不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指出了进行改革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更加精确地论述到：“改革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替代改革的合理的、建设性的选择”。^⑥

根本性的改革逐渐摧毁了苏联政权的支柱。改革引发危机与危机催生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⑦正如科特金所说：“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并且政权稳定。国家外债水平很低，信用评级优良。改革开始之前，国家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国内动乱，并且即使在那个时候苏联也保持了规模不断缩小但依然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内务部和克格勃机构，并且它们都忠于国家。”^⑧同样，阿伦也写到：

“1985年，苏联拥有同10年前大体相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长期存在的物品短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情况曾经比此时糟糕得多……无论如何，在大众的贫困与政策的变化之间即使有联系也是很脆弱的，往往不是导

致自由化的改革，而是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此外，苏联几乎不可能在外部的压力下崩溃。相反，1985年苏联正处于其世界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其根基在于在战略核力量上与美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⑩

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某个时候，这一制度确实面临过全面危机。但是，由此导致的制度变化完全不同于改革。制度变化本来不需要朝着使国家更加自由或者更加民主的方向前进。在苏联精英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国家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也存在着改革主义和更加自由的追求。在苏联的党群机关中，前者的人数比后者多得多，更不要说在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中。鉴于苏联的多民族特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上台极有可能导致流血冲突，会产生一个比掌权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更具强制性的领导者。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正如在改革期间的称呼一样，而且是以新斯大林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为一方，以改革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为另一方的僵持时期。改革对于代表后者的势力来说是一个胜利，但是这一结果并非事先注定的。

改革前的苏联制度

要想了解改革给苏联带来了多大的变化，就必须简要回顾一下这个国家改革之前的状况。在此之前，苏共垄断了权力，对此人所共知的委婉说法是“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其他政党遭到禁止，而且任何带有政治色彩的独立团体也不允许存在。党内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也是国家最权威的决策机关。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共产党被列宁及其继任者视为“先锋队”式的政党。这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倾向于把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存在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同时，又使其能够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吸收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不超过（也不打算超过）成年人口的10%。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6.5%左右，也就是每10个成年人中有一位党员。在绝对数量上，截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夕，共产党有不到700万名党员，到了1990年，党员的数量增加到了近2000万人；随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到1991年夏，党员人数下降到了约1500万人，此时的党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